要素市场经济学

征兵经济学

越南战争结束后来，征兵制很快也宣布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所有志愿兵的形式。未过几年，有关“志愿兵役制的失败”之类的标题充斥报刊，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也一致呼吁恢复征兵制。在我们理解正在讨论什么之前，我们不得不审阅实行将近两个世纪的军事征募制度的开端。

该制度首先形成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马萨诸塞州与弗吉尼亚洲于1777年实行征募制。1778年2月6日，国会提议其他殖民地仿效。不过由于法国派出了军队，当时便不需要开始全面征兵。在1823年的战争中，显然康涅狄格州与马萨诸塞州被胁迫放弃征兵议题。不过，当征兵制在1823年成为法律时，这两个州的立法机构随时准备保护其属民，免受联邦政府的征兵之扰。

1862年4月，南部邦联开始了统一征募，到了1863年，北方认为应当通过入伍法案，该法案的通过导致了流血和暴力事件。实际上，1863年警察和民兵在纽约市的街道上与反征兵的暴乱民众进行了二天的战斗。

然而，尽管美国内战期间进行了征兵，但被征募的人被容许“雇佣”他人替代自己入伍。因此，即便征兵的措施是强制的，而最终准备奔赴战场的决定却是灵活的。例如，一位发现自己被征募入伍的律师，可以选择支付他人一笔赔偿费来替代他自己。只要他所支付的价格低于他留下继续工作所能挣得的收入数额，他就会从此安排中获得经济利益。鉴于诸多工人不能挣到和律师同样多的收入，那么找到一种替代就不是很难的事，由于以双方同意的价格交易，替代者也能获益。可以理解的是，相对而言，内战中的作战人员几乎没有多少是来自高薪行业的。

鉴于一种人对经济的奉献可以大体由他的薪水所表明。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表述，即有效的资源配置随之产生，由于人们在他们的服务最具价值的方面工作或战斗。让我们暂且离开主题，去对资源配置这一问题进行更为充足的讨论。每当劳动力和机器对经济产出的潜在奉献来被充足实现的时候，非效率便存在。

按照定义，从非效率到有效率的配置变化导致产出的增长。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富裕起来。我们经济中的所有变化均有特定的成本，那些承担这些成本的人的处境便会更糟。不过从理论上说，产出的增长容许那些承担变化成本的人们得到充足赔偿。前提是假设某种制度机制存在，通过这种机制，赔偿性的“边际支付”可以得到实行。

目前我们回到美国军队建设的措施这一历史问题上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征募的形式成为一种纯粹的彩票抽奖，不容许被征入伍的军人雇佣他人替代。从美国内战直到朝鲜战争，总计11448330人应征入伍。从主线上说，同样的经济学分析合用于这些冲突中的所有人。

未能被注意到的成本常常是与非志愿性征募的这一措施有关的。为了简化阐明，让我们分析一下军队，把它当作一种行当，将雇佣和解雇“工人”看作是“经理”将他们固定年预算中的部分分派，用于支付替代员工的机器的人。当军队以低于这些以其自由意愿被征入伍者所能接受的工资率获得士兵时，军队经理们获取的是有关他们营运真实成本的不对的的信息。当劳动力成本(由于征兵制)被人为

地减少价格，军队管理以使用比他们有也许使用的更少机器和更多的人员而告结束。

这是为何呢？决策是根据下列线索而做出的：在一给定的人力价格上，军队必须考虑增长机器来协助人员或在特定工作中取代他们的也许性。假如增长一台额外的机器，将容许在没有机器的状况下一种人去做两个人所要做的工作。管理层必须审阅相对价格，以便有理性地决定与否应当租用机器(或是购置)。

假如一种人每周花费100美元，而一台额外机器的租金是25美元，机器将会被使用。不过假如人工的价格减少到每周20美元，那么为了节省劳动力成本而租用机器，从经济上说是不值得的。由于被征入伍的军人们，实际上所支付的价格远低于劳动力市场上的“现行价格”，或者低于使他们志愿入伍的价格。我们懂得，这种征募导致军队中出现高于最优的人机比率。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此举不可防止地使社会花费比国防水平所必需的成本更多的资源。

另一增长的成本来自于经典的征兵制中仅有两年服役期限这一事实。从所有相似之处说起，完全以厂家雇佣工人(即支付足够的工资)方式获得的志愿者所构成的军队，职位补缺时间将超过两年。实际上，鉴于军队必须毫不合糊地支

付比那些在征兵条件下高得多的工资，相对而言它的管理层正在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保证职位补缺的时间实质上更长某些。

职位补缺波及确切的真实成本，当一名士兵入伍服役时，他是一种“新兵”，必须加以训练，训练波及诸如机器以及对其他人的时间等资源的使用。当一名被征入伍的军人两年服役期满时，他人必须花费更大的成本来得到训练以弥补他的职位。

除了与征兵制有关的相对较高的职位补缺成本之外，征募还导致被征入伍人才的非效率配置。在平民世界中，人们很少会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洗碗工或户外清洁工为业。雇主将这些人分派到最能增进生产率的岗位上，也就是说，他们对厂家的产出奉献最多的岗位。而在实行征兵制的军队则并非如此，所有被征入伍的军人是以相似价格获得的，无论他们是博士还是半文盲。

如同在商业中，对军队管理层来说，最有效率的使用被征入伍者的动力或许存在，不过其信号并非像在平民世界中那样明显。在那里，不一样素质的工人的薪水差异是清清晰楚的。要雇佣一位博士，企业必须支付比一名未受过教育的工人更多的薪水。一家商业企业以将博士投入他或她最能发挥效力的岗位的方式，获取对企业所支付薪水的尽量多的回报。

除了上述成本，经济因每一被征入伍者而承受一种机会成本，该成本完全独立于被征入伍考所得到的支付。一种被征入伍者的社会真实成本是他作为一位平民时所能挣得的收入。当一位雇主付给某人10000美元，我们一般可以假设该雇主正在获得至少等于其价值的服务，否则这一安排便会终止。假如同样的人被征入伍，等于他放弃一年大概相称于10000美元价值的平民生产性服务，以获得总数少许多的军事性服务。这一数额并不是军队支付给他的，譬如说1500美元，才是他入伍真实的年度成本。

既然一支实行征兵制的军队仅支付(通过税金)被征入伍者真实机会成本的一小部分，那么，谁来支付其他部分呢？显然，被征入伍者他们自己承受大体与他们的平民收入和服役收入之间差额相等的隐性税的承担。不过所有人均不一样程度地遭受损失，由于鉴于这些人不在他们的平民岗位上工作(除非所有被征入伍者都是选自失业大军中)，非军需品与服务的产出更低了，而费用则更为昂贵。

征兵制的这一隐藏税性质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两百年前，本杰明·弗兰克林在审查法院有关美国商业水手被强征服役的合法性时作了如下评论。他写道：“假如根据我的推测，这种情形是常常发生的，在压力与胁迫下，某些本可以在商业服务中每月获得3镑15先令收入的水手被征服役，以每月25先令的代价保卫这一贸易，而你们每月从他身上获取50先令。并且假如你们在自己的服务中获取10万美元，你们便是从社会上忠诚的那部分人，及他们可怜的家庭中每月抢劫25万英镑，或每年抢劫300万英镑。同步强迫他们为捍卫你们的贸易而冒自己生命危险。”

对这一隐性税分派的审阅，揭示了我们过去惯常使用的征兵制度对富裕者极为有利，而对贫困者极为不利，这重要是由于有较高收入的征兵对象可以获得豁免。它实际上是一种高递减税，即按收入的比例而言，收入水平愈高，所支付的税率就愈低。抽签制度，对于那些大学生和硕士的豁免，仅仅是放大了递减效果。

贫穷者和少数民族商中有多大比例继续中学后来的教育？甚至在抽签制度下，富裕者拥有号召的资源：律师、医生、心理医师可以协助他们防止征兵。1969年有283000人被

征入伍，其中仅有28500人受过高等教育。这一数字仅占被征入伍总人数旳10%，而美国高等教育适龄男性人口总数中，有40%旳人正在接受大学教育。大学延期服役旳成果因而有所减弱，不过并未医治“征兵税”旳递减效应。

美国公民被告知所有实行志愿兵役制的军队过于昂贵，这一埋怨完全偏离了要点。无论我们国家中的青年与否被征兵，社会都要为军队进行支付。那种说不能寻找到足够数量的志愿兵的说法也是不真实的。由于1978年的最终3个月表明：规定入伍者中仅有90%被同意入伍，这并不竞味着我们军队的实力下降了。1973年终，军队多录取了2023名超过预算数字的士兵，新兵短缺由于对剩余人数的重新录取而大大地得到弥补。假如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只有在某些特殊岗位，例如医疗与预备役方面才会存在。只要国会决定支付可观的价格，以吸引所但愿的数量与质量的预备役人员和医务人员，这些亏空可以随时被消除掉。

当我们审阅有关质量的数据时，当国会说实行完全志愿兵役制的军队已经失败时，它的意思并不完整。1964年，当我们仍在实行征兵制时，新兵中68%的人是高中毕业生，197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70%。1964年，1/7的新兵被归类为最低智力组，但仍校征入伍。到了1979年，该比率下降到1/20。

如同在所有经济情形下，不充足的供应可以归咎为价格过低。事实是军人并未获得有竞争力的工资水准。在1972年，军人工资率确实具有竞争力。然而到了1980年，他们大大地落后。因而军队在弥补其人力配额时显得困难重重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不过，里根政府确实做出某些努力，将军队的工资支付尺度提高到一种愈加具有竞争力的水准上。

军队削减其劳动力成本的途径之一，便是招募已经受过训练的平民人员，以弥补中级职位。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个人可以被雇佣，从事军队中的技术性和管理类工作，而保留其平民身份。目前从主线上说，军队中所有中、高级人员来自军队内部。因此，被迫保留和训练士兵，以弥补重要的技术性和管理类职位。为何不能到劳动力市场去雇佣平民呢？他们被保留平民身份，从事技术性和管理类工作，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并非从事“前线”工作，他们真的必须成为士兵吗？

从效果上说，征兵是对军队人员进行剥削的一种形式。代之以市场出清的工资率支付的是在征兵制度下，政府选择以低于市场出清的工资率的水准支付，并且规定特定的个人“为祖国服役“。从社会的角度看，军队的成本是相似的，无论是对军队人员一文不付或向他们支付市场工资率的二分之一，还是向他们支付完全的市场工资水准。军队的成本是所有社会机会成本——

相称于每个人作为平民所能挣得的收入，军队的社会机会成本并不取决于谁为军队支付。征兵制度有效地向那些被征入伍者课税，一支所有志愿兵役制的军队既不廉价，也不比一支征募的军队更为昂贵。

职业性体育竞技经济学

1981年的垒球赛季较短，为何？由于有过一次罢工。在这一赛季中的50天，运动员们与球队的老板们无法到达协议。显然，争论中的重要焦点是所谓自由代理人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哦，它波及到运动员与在他们目前服务的球队所签订的特定协议期限结束时，无限制地在垒球行业中寻求更好的雇佣机会的自由。

直到1981年，垒球运动员在球队之间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建立在运动员协议中的“保留条款”基础之上的。该条款予以球队独自占有运动员服务的权利，直到他被球队出卖、互换或释放为止。作为这一条款的成果，许多运动员对职业垒球联合会的老板们提出反托拉斯的诉讼。例如垒球运动员柯尔特·福拉德在70年代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诉讼，当此案于1972年被转送到最高法院判决时，福拉德败诉。即便法官哈里·A·布莱克芒恩也承认：保留条款是“歪门邪道”。

作为罢工的成果，垒球运动员们在消除保留条款有害效果方面是相对成功的。橄榄球运动员在1982年秋季举行罢工，然而他们未能像垒球运动员们那样成功，目前他们在一种使运动员被单方面地约束在特有运动员协议的球队体制下工作。尽管已经有了某些调整修正，不过保留条款似乎仍然相对有效。

要想弄明白为何保留条款已经在垒球、篮球、橄榄球方面被延用这样数年，我们将首先审阅一种没有保留条款的劳动力市场—

招募园艺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多数园艺工人索取他们认为是目前“通行”的行业服务价格，假如有人索取比此价格低诸多的价格，某些潜在的额外客户就会最终发现，那时他将发现自己面对许多新的需要他服务的祈求。假如他不愿将额外的时间投入园艺工作，他就不得不在下列进程中的一种或组合中做出决定：(1)减少他服务的质量，以便每一工作所需时间减少，因而可以按出时间为更多的客户服务；(2)拒绝增长工作；(3)提高他服务的价格，以便使特定的顾客(目前或潜在的客户)不会对获得他的服务感爱好。显然，第一种选择与第三种选择相称，由于同一价格的质量变化与同等质量的价格变化产生了同样的经济效果。

另首先，一位没有工作并但愿吸引更多客户的园丁，可以自由减少他的价格或提高他的服务质量。也就是说，园艺工人们可以在他们自己中间竞争，以便他们自己个人的收入极大化。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所有的园艺工人都会这样做。

目前让我们假定某一特定的园艺工人享有工作技艺杰出的声誉，假如他已经排满了日程，一位潜在的客户将不得不开出在正常价格基础之上的某些鼓励以获取他的服务。一种足够的鼓励有也许说服该园丁做下列事项中的某一项：更大强度的工作；工作更长时日，减少节假日；剔除一位他先前已接受的客户。

一般的鼓励形式是提供更高的工资，虽然鼓励并不总是以货币表达的。在任何状况下，通过运用这样的方略，意欲获得园丁服务的人们会在他们自己中间互相竞争。尽管并非所有家庭主人会花费精力去理解周围哪个园丁能以最低的价格提供最佳的服务，但仍有人会这样做。

我们刚刚已经描述了一种竞争的园艺市场的工作状况。园丁们可以自由地变化他们所发售的服务价格、数量和质量。家庭主人们可以自由地变化他们所提供的价格(工资)，以及他们所欲求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从理论上说，园丁们是以获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们服务价值(即他们是以他们的边际产品的价值被支付的)而告结束的。园丁服务的购置者是以不多不少地支付这些服务的机会成本(即他们必须支付园丁们的边际产品价值)而告结束的。

假如全国所有的家庭主人汇集在一起，并且决定起草一份“园艺工作保留条款”，将会发生些什么？该条款会规定每一位园丁只为一位家庭主人工作(或在此状况下更为现实的措施是，为一批家庭主人工作)。该园丁不得在任何其他地方工作，除非附有保留条款协议持有人决定他自己(该协议的持有人)想要发售或互换这一协议。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先前描述过的竞争市场的一种关键方面已经被消除：园丁们不能寻找到最为有利的工作机会或进行业务竞争，由于只有该家庭主人才能首先提出变动。极为明显的是，这种约束将制止园丁们寻找使得他们收人最大化的雇佣机会，并且会使他们的境况比在自由与竞争条件下的状况更差。

假如所有的家庭主人都汇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明确协议的卡特尔，即他们不会在他们自己中间竞争以获得园丁协议，园艺市场的竞争将会在两方面受到克制：在园艺服务的发售者中间和这些服务的购置者中间，园丁们的境况也许、并且肯定会比此前更差。

我们所举例子中的纯假设正是垒球世界中延续很数年的现实。两大联盟球队在他们自己中间到达协议，并由此产生了极为尤其的运动员协议。由于条款包括了一种不得收买出任何球队“保留”的球员的协议，签立协议的俱乐部因而持有运动员下一年度服务的单方面选择权。一旦该运动员签订了协议，他就接受了球队之间所到达的所有协议。因此，他的唯一方针是企图从他所服务的特定球队获得也许到达的最高工资，而不能从竞争中的众多球队中获得任

何协助。运动员的选择是较为简朴的：要么接受球队所提供的薪水，要么不打垒球——

至少不为美国两大联合会中任何球队打球。

保留条款容许垒球队约束垒球运动员职业市场的运作。因此，一种垄断要素进入了垒球雇佣行业。垒球队都众口一致地说，保留条款是该项运动中必不可少的。由于它容许在所有球队中公平地配置优秀运动员。并且有人推断说，没有保留条款，较为富裕的俱乐部就会竞价挖走最佳的人才。比赛就会向一边倒，而感到索然无味的观众们就会停止买票看球。

乍看起来似乎有理，但当人们意识到任何行业都可以做出类似的陈说时，这一论点便失去其真实有效性。实际上，富有的企业不会竞购所有最佳的工人，并因此使得生产“竞技”倒向一边。假如这样做的潜在报偿足够高的话，企业与垒球俱乐部可以总是借钱投资于好的工人和好的运动员。显然，只要一种好(富裕)的球队存在，建立一支具有竞争力的强队的报偿，就会高得足以便俱乐部借钱(或发售额外的股份)去这样做。

并且运动员的价值取决于门票收入，仅仅有一种强队，门票的销售额会有多大呢？很少有人乐意去看最强、最富有的球队所参与的每一场比赛中如同屠宰式的大获全胜。因

此，强队应当保证有其他强队与之竞争，以产生悬念、激动以及由此产生旳高额门票收入。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尤其严禁约束贸易的行为，不过最高法院在1923年裁定垒球队可以免除受此类联邦立法的制约，并且它的裁决在1953年和1972年得到赞同确认。保留条款是一种约束球队争夺运动员的企图。作为其成果，运动员所挣到钱要少于无此条款时他们也许挣得的钱。

保留条款对运动员的影响力，在相称长的时间里，因国家联盟和美国联盟之间不再互相争夺运动员的协议而有所增强。这样一种安排会暗示第三家联盟以开出更高薪水的方式，从这两家挖走最佳运动员的潜在也许性。然而没有第三家美国联盟可以成立，由于与之签订协议的运动员将会被永久性地排斥在国家联盟和美国联盟之外。很明显，不会有足够多的运动员乐意冒此风险，当然也就不会有其他重要联盟出现。

为了试图对抗垒球队老板们的垄断势力，一种垒球运动员工会建立了。工会最终使得运动员获得更高薪水，以及改善他们的养老金计划的企图得以成功。它最终还成功地从运动员协议中删除保留条款。

至少一直到1982年，职业性橄榄球几乎完全是职业垒球过去的翻版。国家橄榄球联盟从1923年起一直是唯一的联盟，直至1960年，美国橄榄球联盟出现为止。伴随美国橄榄球联盟的出现，运动员的薪水迅速成倍地提高。

当国家橄榄球联盟统治时，球队可以“招募”运动员，并且有效地随心所欲地保留他们，不容许有高额薪水挖墙脚的竞争。国家橄榄球联盟的球队老板们之间串通一气的协议制止了运动员们使其收入到达最大化，并且没有现存的与之竞争的联盟来竞价挖走他们的运动员。

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招募制度开始于1936年，该制度严禁联盟中的运动员与任何招募他的球队以外的职业球队进行洽谈。一般来说，联盟中最差的球队被容许首先进行招募选择，大概是在即未来临的赛季中予以他们一次更好的机会。

十几年前，华盛顿的北美印第安人队招募了一种明星后卫——

吉姆·(雅楚)史密斯，他在俄勒冈大学的记录给人以深刻印象。并且作为一种新手，他为印第安人队杰出地完毕了开始的营垒。不幸的是，在那一季的最终一场比赛中，史密斯突遭严重的颈部损伤，并因此结束了他的体育生涯。1976年9月，美国大法官成廉·B·布莱恩特向史密斯判决了276000美元的赔偿金。这并非是由于他的身体损伤，而是由于他遭受了经济损失。

史密斯争论说，联盟的招募制度限制了他与印第安人队在价格上的争议权，成果该谈判是完全的一边倒，以至于他被制止获得一份在他一旦遭受残疾损伤时，将予以他经济保障的协议。当大法官解除国家橄榄球联盟每年一度对大学选手的招募时，他评论说：“这种对协议的彻头彻尾、毫不掩饰的拒绝，以其经典的和最为有害的形式构成了抵制集团，一种长期被训斥为公然违抗反托拉斯法的手段。”布莱恩特深入补充说，招募程序“绝对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具有限制性的东西”，他还指出了国家橄榄球联盟为了迎合法院而有也许采用的某些变化。例如，三支球队

可以被容许挑选同一种运动员，然后竞价争夺那一运动员的服务，这当然会改善运动员的议价地位。

1966年，在六年旳“竞争”之后，美国橄榄球联盟和国家橄榄球联盟同意进行合并，国会同意了作为众议院法案附件旳这一变动。这一合并已经影响了运动员旳自由，虽然条款注明了在干完他协议旳一年选择期之后，运动员可以与另一球队签约，假如他这样做旳话，第二支球队就心须向他原先旳球队交付赔偿费，显然这打消了第二支球队招募旳积极性。

运动员也可以试图通过橄榄球掮客安排交易，然而迄今为止，对于所波及旳运动员来说，此类谈判尚未得到对自己非常有利旳结局。以防止有争夺运动员需求出现旳形式，美国橄榄球联盟与国家橄榄球联盟已经明显地使得运动员旳薪水低于他们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有也许得到旳薪水。

职业体育竞技中任何类型旳保留条款有效地限制了球队老板们在一种不受约束意义上争夺优秀运动员旳能力。在招募制度中，保留条款旳后果是，将运动员旳薪水削减到比他们在非限制性竞争劳动力市场中所获薪水更低旳水准。招募制度中旳保留条款，只会在球队老板们共同抵制以获取对购置运动员服务旳垄断(这种类型旳垄断被称作独家购置)状况下出现。只要法院继续容许联盟重要职业球队旳老

板们共同抵制、违犯反托拉斯法，此类状况才也许持续下去。

非法移民经济学

每年大概有40万人被许可合法地移民到美国，每年至少有此外100万人非法地移民到此。这些人是“无证移民者”或用更为简朴的说法，是非法移民者。他们来到这一国家基本上是为了一种目的：寻求更好的工作。

1981年和1982年，每年大概有100万非法移民被移民局官员所制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边境一带，有人被逮捕了若干次。实际上，有一位执着的墨西哥人一天之内就曾被逮捕了5次。

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的总数估计在500万至1200万人之间，某些都市尚有比他们应摊“公平”份额数多得多的非法移民，例如说洛杉矶、圣地亚哥和迈阿密就是这样。用于追捕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他们本来国家所花费的资源数量已经迅速地增长。实际上，根据美国众议院有关这一主题的听证会记录，“在美国被逮捕的非法移民数字似乎已与移民与归化局工作人员的数字直接成正比”，毫无疑问，非法移民似乎成为美国的一种难题，而过去并不总是这样。

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严禁罪犯、妓女、疯子和痴呆者移民为止，美国对移民入境几乎没有任何限制。1888年10月19日通过的法案规定将那些违法进入美国的移民驱赶出境，一直到1923年的移民法公布，有关移民的现行法律的第一种系统安排才正式生效。这些法律包括对识字的规定，并且对东方人有某些苛刻的限制。在1924年的移民法中，对于来自东半球国家的移民强制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而对来自西半球的移民却仍无限制。到了1965年，每年对东半球移民数定有12万人的上限，而对西半球移民的上限为17万人。

那么从历史上看，直至20世纪，美国从主线上采用的是开放政策。在其开放政策实行的几乎各个历史时期，美国保持了持续的成长和繁华。目前的问题是，假如它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确实与成长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相联络，为何公共政策还要寻求变化无限制的移民？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审阅人们为何要移民到美国的原因，他们的移民对劳动力所产生的效应以及过去美国人为何常常从中获益却又似乎认为他们不再从中获得利益了。

人们为何要移民？一般来说，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为

何这样数年来有德国人、瑞典人、意大利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墨西哥人和中国人想要到美国来，也许有诸多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不过压倒一切的动力是经济方面的动力：他们想要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准。

一种出于纯经济原因的迁移决策，不仅建立在潜在的收益基础之上，并且立足于迁移所波及的多种成本。最为明显的(并且相对是最不重要的)迁移成本是交通成本，随之而来的便是入境后搜寻工作职位的成本。假如该移民已经很久未工作，这一成本也许会很高。另一成本是在一种不一样的都市或国家建立起一种新的家园，拆除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家园。这一成本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并且尚有心理方面的——
即失去老朋友并试图结交新朋友，与亲戚们离别等等。

所有这些迁移成本都是在一开始时就引起了，因此它们在移民者的心目中隐隐显得高于他或她在另一国家工作有也许获得的较高收入的潜在性收益。那么，所预见的工资差异(由于这确实是人们所必须审阅的)，必须与几乎是立即因此而引致的，但一般来说是一次性的移民成本相比较。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06035203045010150